

目 录

- 资源委员会移沪迎接解放亲历记 季树农 (1)
- 解放前夕的资源委员会 吴兆洪 (29)
- 资源委员会在宁沪迎接解放的回忆 谢佩和 (41)
- 资源委员会在广州迎接解放的经过 冼子恩 (55)
- 张之洞事迹述闻 張达驥 李石孙 (65)
- 两湖书院忆闻 陈英才 (88)
- 经心书院述略 楊湖樵 (98)
- 张之洞与两湖总师范学堂 朱峙三 (106)
- 塘沽协定后“中央军”在华北的
几件事 杜聿明 覃异之 (114)
- “九一八”后陈炯明勾结段祺瑞联日倒蒋的
秘密 丘健军 (119)
- 张志和与四川民盟的革命活动 張發英 (123)
- 南京汪伪几个组织及其派系活动 張潤三 (157)
- 汪伪政权“建军”拾零 胡幼植 傅大兴 (171)
- 汪精卫“建军记” 曹玄庆 (181)
- 蒙古亲王那彦图的政治活动及
生活纪略 祺克泰 孟允升 (185)
- 北京几个大寺庙的内幕 全信和尚 (203)

资源委员会移沪迎接解放亲历记

季树农

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主办重工业的部级机关。抗战胜利后又接收了日伪企业，合并组成一百一十一个总公司或总机构，共有生产单位近一千个。此外尚有研究、勘测及服务性事业单位若干。共有职员三万二千八百多人，其中40%为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共有工人六、七十万人，其中技术工人约二十二万人。解放战争中，除台湾一省外，全部企业完整地归于人民。之所以能如此，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和军事的胜利，指引了正确方向；其次是领导人的觉悟，迷途知返；再则是广大职工明辨是非，人心所向，齐心协力护厂护矿。三者缺一不可。

资源委员会迎接解放的全部经过，原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九辑撰有《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留在大陆的经过》一文，叙述甚详。《上海文史资料》《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刊有该会副委员长吴兆洪《弃暗投明迎解放》遗文，作者当时冤狱初平，语焉不详，且原文删节过多，未能达意。

我长期任该会简任技正兼财务处处长，和中共上海地下党进行过较长时期的联络，又于解放前夕环境险恶时，奉命代表该会与中共派出的代表正式会晤。资源委员会决定移驻上海迎接解放时，我兼代主任秘书职务。濒临解放，孙越崎南去广州辞职，吴

兆洪躲避特务，匿而不出面时，由我支持残局，直到解放。其中经历有为以上两文未曾著录者，为了补充这一史实，特将亲自参予以及亲见亲闻之事，撰成此文，以供参考。

寻觅共产党

一九四八年十月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在南京召开秘密会议，有主要企业总经理和会本部负责人约三、四十人出席。他用共产党解放鞍钢重视知识分子为例，检查了他以往撤退东北工矿人员入关的错误，号召今后坚守岗位，保护财产。与会者心领神会，发言支持，无异举行了一次迎接解放的动员大会。不久，淮海战役打响。一个周末，吴兆洪约我星期日到上海路北秀邨一号他家去，先后到有杨公兆、许本纯、陈中熙、洪中和、恽震等六、七人，都是各部门负责人。大家见面就谈战局，吴兆洪发问：“孙委员长号召坚守岗位，今后怎么办？一旦淮海战争败阵，南京必定动摇，那时如果跟着去台湾，或重庆，将是跟着殉葬；如果不跟着去，又何以图存？”座中杨公兆、许本纯两人认为，如果不跟下去，就得找找共产党，通通气；要不然，共产党来了，就会玉石俱焚。杨公兆还说，他早年在德国读书时，曾经认识几位共产党员，但现在都已失去联络。吴兆洪于是讲了一个钱昌照和孙越崎找共产党的故事。他们多次商议，由钱昌照利用到欧洲考察的机会，经捷克进入苏联，再转入中国东北解放区。但是，考虑到捷克和苏联都与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恐怕不易越境，结果，谈来谈去，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办法。当时我没有表态。第二天我单独去找吴兆洪，我说：“找共产党已刻不容缓了，一味清谈不见行动，不正是‘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吗？”我又说，“你们

找不到，我却找到了。”吴兆洪又惊又喜，问我怎样找到的，我于是把我堂侄《大公报》记者季崇威是上海地下党员，我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从美国回来，他和我联络的事，透露给他。我又说：“你们曾让我在财务处和秘书处两个职务中挑选一个，我选择了仍当财务处处长，这还是他的参谋。他说‘抓实在的，以后有用’。”回国后我因业务关系经常往来宁沪，每到上海，必和季崇威密谈，主要是介绍资源委员会的情况，特别是领导人的思想倾向。我认为那些领导包括翁文灏在内，都不是蒋介石的死党，而是一批书生气十足的“工业救国”迷。抗日战争初期，他们为了抗战，忠于“正统”、忠于民族，在川、滇、黔、桂努力办了几处工业基地，支持过抗战。后来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榨取民脂民膏，用于内战，而对工矿事业的投资却十分吝啬；同时，官僚资本垄断市场，与民争利。有一次翁文灏在纪念周讲话，说孙中山先生主张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而现在的建设银公司等官僚资本则与之背道而驰，这样如何实现中山先生遗教云云，对国民党政府能否建设中华已存怀疑，后来国民党政府投靠美国，抗战胜利后，大批美援和剩余物资充斥市场，资源委员会几将成为点缀品。资源委员会各级负责人以切身体会，逐渐看透国民政府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但日本投降后，接管抚顺煤矿的工程师张莘夫毙命；东北解放战争中，北票煤矿工程师俞再麟被害，实际上是两桩意外事件，而国民党政府借机诬蔑共产党谋害知识分子，资源委员会负责人不明真象，又陷入彷徨无计的境地。针对这个基本情况，只要消除这方面的思想障碍，很有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我还告诉季崇威，蒋介石命令要拆南京五个新建工厂去台湾重建，孙越崎不愿拆又不得不拆的经过。季崇威也告诉我不少解放区的消息，送给我香港出版的进步刊物，并说全国解放为期

不远了。

不久，吴兆洪把我和地下党的关系向孙越崎反映了，孙非常高兴。吴说：“季树农顾虑多，要我知道就算了，不要对你说。”孙越崎于是直接和我密谈，鼓励我大胆继续保持联系。从此，我和地下党的秘密联系，在正副两位委员长的同意下，顺利进行。他们多时寻找共产党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资源委员会成立以来，没有编印过职员录，这时人事室不先不后编印了一本《资源委员会职员录》，除刊出会本部全体职员姓名职称外，还附有附属单位的正副负责人姓名。规定这是密件，人事室编号发给职员签收，不许外传。我觉得这个文件对于争取同事弃暗投明可能有用，就把封皮撕掉了，送给季崇威。在上海濒临解放时，我和许多同事都收到了油印密信，是共产党的宣传材料，号召大家消除顾虑，留下来共同建设新中国。在这封信中第一次见到“反戈一击有功”等新名词。我送的那本《职员录》发生了作用。

一九四九年一月，我在南京，忽接季崇威电报：“明晨抵京，请到站接”。翌日黎明，我驱车到下关接了他直驰玄武湖。时届隆冬，湖上渺无游客，我们舍车进了湖边的一家茶馆。季崇威坐下来低声对我说：“蒋介石已经下台飞往奉化了，今天可以见报。我这次来是想请你找孙越崎设法停拆南京五厂。”我说，“孙越崎正在拖延搪塞，工作进行得很慢。”季崇威还是要我努力敦促。季崇威在我寓所留宿一宵，他发现我的妻子已去台湾娘家过春节，生怕我们发生动摇，作了许多鼓动工作。我的岳父母年纪老迈，全家在台湾，原来我要打算多住些时，为了表示态度坚定，春节刚过我就叫她返回上海了。

二、三两月间，我和季崇威接触少了，主要是他告知上海地

下电台被国民党破寨，有人被捕，我自己也担心会出事，约定尽可能少接触。

人事安排

一九四八年南京十月会议确定“坚守岗位”的方针后，第一个行动是人员的疏散。首先考虑到南京是蒋家王朝的巢穴，发生战事是难免的，资源委员会本部共有职工约四百余人，人数虽不多，但为了便于行动，应加精简。当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南京公务员情绪已趋浮动，决定允许原籍在西南、中南的职员在自愿的原则下调往各地办事处工作，除原有昆明、重庆办事处外，新成立长沙、桂林两处，不少职员在十一月起即陆续疏散到上述四个城市工作。他们仍作为资源委员会编制内的人员，工资仍由资源委员会发给。

当年年底，国民党政府各机关纷纷议论“迁都”，秩序日益混乱。部分职员看到会本部按兵不动，有起哄闹事现象。孙越崎亲自召开大会，表示他与职工同进退，决不抛弃同事于不顾，这才使混乱平息下来。接着（一九四九年一月）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孙科宣布迁政府于广州。资委会留在南京已属非法，于是也打起“迁都”旗号，将剩下的职工分成两批，一批叫“随行人员”，顾名思义是迁往广州的，实际上是转移到上海就不再走了；另一批叫“留守人员”，是自愿留在南京的，包括一些年老的、本地的职员和全部勤杂人员。

“随行人员”的名单由孙越崎、吴兆洪和人事室主任吴福元等挑选，包括全体业务委员和秘书、总务、财务、会计四处，人事、经济研究、参事三室的负责人，以及与会本部在同一大院内办公的

煤业总局、金属矿业管理处、钢铁业务委员会等单位的部分人员、并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他们由副委员长吴兆洪带队，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分批到达上海，借用四川路桥堍“资源大楼”中央造船公司筹备处办公，随带印信、重要档案、资金、帐册、以及电讯事务所总电台等，实际上是把资源委员会从南京移到上海，不打算再走。

在南京的资源委员会会址是山西路虹桥路二号，原系日本一个小学，院落很大，资源委员会兴建了煤业总局、金属矿管理处、保险事务所三座办公楼和三幢家属楼，职员基本上每户一单元。

“随行人员”迁走后，留下大宗科技图书、大宗过时档案、数百部科技电影胶卷，以及大量生活用的物资。孙越崎本人应李宗仁代总统之邀，留在南京，筹组和谈代表团。他根据实际需要，将“留守人员”组织起来，取名为“员工励进会”。这是一种群众团体性质的组织，由我推荐财务处青年科员卢英立为主任，负责照顾留守人员和全部财产。南京有不少工厂和筹备中的工厂，距南京不远的马鞍山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矿基地，因此有必要加强领导。恰巧电业管理总处处长陈中熙表示愿意留在南京，孙越崎又成立“资源委员会南京办事处”，发表陈中熙为兼处长，谢佩和为副处长，原已成立的“员工励进会”也划归陈中熙领导。

资源委员会会本部分作随行、留守和外放三批人员后，都分别驻在当地不动，坚守岗位，直到各地解放。

随着战争的日趋紧张，上海方面“随行人员”长期逗留不动，引起社会注意。当时国民党行政院派有参事齐某坐镇上海，督导人员南迁，曾多次分发去广州的飞机票，我们一再婉言谢绝，后来又借口自己包专机运送，拖延时日。但日子久了，深恐败露，正苦难以应付，恰巧台湾水泥公司董事长张竣来访，要求拨

款包专机去台北，我立即同意了，吴兆洪也立刻批准了。我们故意将包机的消息传到那位姓齐的参事方面，从此他才不再来催促我们。飞机包成后，张竣到处拉人赴台，职员已认清形势，应者寥寥，一架飞机五十个座位，只坐了不到十人。派去送行的总务处黄孝资回来说：机舱太空，张竣把小汽车也装上了。黄当着我们的面大骂张竣办事不当，我当作没有听见。我们用一架包机的代价，换来了上海众多人员的安全感，卸掉肩上的压力。

资源委员会重心移到上海，吴兆洪安顿职工生活后，即赴南方各企业视察，日常事务无暇兼顾，会领导决定由我兼代主任秘书，以便集中事权，有利于活动。主任秘书领导秘书处，下设机要、文书、档案各科，另外还有简任秘书一人，秘书若干人。附属企业之一的电讯事务所，也归秘书处领导。电讯事务所在全国工矿企业集中的地区设有电台七、八十处，对于解放前的指挥调度，起了相当的作用。

上海物资储存和汤恩伯的追查

上海是中国进出口的最大港口，资源委员会主管物资进口的材料供应事务所设在这里。凡资源委员会直接掌握的物资，由该所集中办理进口和分配，主要有成套设备、五金材料、工具仪表，以及美援或救济总署拨给待分配的大批生产资料等等。资源委员会出口的物资主要的为江西的钨、湖南的锑、贵州的汞、云南的锡、海南岛的铁沙等等，由金属矿业管理处主管，其外销业务由国外贸易事务所经营，所得外汇由财务处掌握。资源委员会在台湾有十大公司，他们在上海设有营运处，供应全国的食糖、铝锭、铝制品、纸张等大都运存上海仓库和私营堆栈。

上述各类物资的仓库大小七十余座，分散在上海各个角落。

资源委员会定决定与国民党政府分道扬镳后，一面加强物资的进口和储存，一面拖延钨、锑等有色金属的出口。五金材料和工具仪表等，凡为各企业所通用的物资，都加速分配。美援和救济总署拨给的器材为数较多，材料供应事务所储运能力有限，其中属于发电设备的，例如五千千瓦火力发电机十套，交由电业管理处处长陈中熙接收分发；属于煤矿设备的，例如卷扬机、空气压缩机、煤矿成套机械等设备，交由煤业管理总局副局长吴京负责从长江溯江运至武汉、长沙、株洲等地保存。所有物资中，以石油一项储存最为困难。资源委员会所属中国石油公司设在上海，油矿则在甘肃的玉门和新疆的独山子。此外，该公司并经理军用油料的进口事宜。当时在上海储有汽油约一千八百万加仑，进口原油约十万吨，注满了高桥油库的金部油槽。油料易燃，星火可以燎原，依赖油库职工冒险犯难，日已继夜地坚守岗位，得以安全保存下来。原油原从美国直接运到台湾高雄炼油厂交货，后该公司副总经理郭可诠改交上海，准备交与人民。上海解放后，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副部长孙冶方利用这批原油，在高桥建立了上海炼油厂，为新中国自己炼出第一批油料。另外还有一种物资保藏也成为问题。中国油轮公司有小油轮十艘，为黄浦江两岸工厂输油作业。上海形势严重时，油轮日夜游弋于黄浦江上，引起国民党政府军宪机关的注意，突然将油轮公司顾副经理扣押，勒令将油轮撤走或破坏。该公司总经理王某来“资源大楼”向吴兆洪告急，设法营救，商定立即乘黑夜将油轮的阀门打开，进水下沉。当地军宪以为达到破坏目的，允许顾某保释。解放后，轮机人员很快就把这批油轮打捞起来，依旧日夜游弋在黄浦江上，为两岸工业企业供应油料。

正当顺利安排各项工作时，黄汝鉴秘书慌张地把一份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命令”给我看，上面写道，“查资源委员会物资疏运不力，仰即查明具报，切切！”汤恩伯是杀人魔王。主管上海资源委员会的吴兆洪以及在李宗仁南京幕府的孙越崎都紧张起来。吴兆洪找来材料供应事务所所长蒋易均，请他出面召集上海各企业主管物资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对策。与会者都懂得这一“命令”的份量，但他们也懂得台沪间船只已为警备司令部征用，研究结果，与其进行解释，不如以攻为守，“将他一军”，要求派船抢运。于是连夜编造了两种清册，一份叫《半年来已运台湾物资清册》，把台湾十大公司在沪采购的物料全部列入，表明运转物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另造一份包括各仓库存量多、体积大的器材，名叫《急待抢运台湾物资清册》一厚本，二十多人编写到第二天傍晚才完毕，由黄汝鉴缮写复文，“恳切要求抢运。”这时台糖公司上海营运处处长彭养怡自告奋勇，愿意前去投递。他是上海各轮船公司的大主顾，所有往来于台北、上海间的航运情况，他都清楚。船只被警备司令部接管后，他又常和司令部某参谋长打交道，因而相熟。彭说：“怕什么，他妈的，他们装官太太还来不及，肯替我们运机器？”他抱了一包公文去了。我们守在办公室，忐忑不安。不到一小时，老彭若无其事地回来了，“没啥事，没啥事！”又说：“我找到参谋长，我问他为了台糖公司的物资，找过你批给运输吨位，你给了多少？现在忽来阿罪了。资源委员会大批物资早已准备要运走，不派船的是贵部，打官腔又是贵部。”那位参谋长只好说了一通“军运第一”的大道理。彭养怡把公文交了，拜托他“手下留情”，早早批给船只。这是一幕惊险镜头，一场可能人头落地的灾难，几句话就化险为夷了。

沈镇南、刘晋珏两位总经理的死难

上海方面物资储散情况，已如上述，虽则遭到汤恩伯、雷震、方治等的追逼，但我们群策群力，急中生智，应付过去。资源委员会本部职员原来就不多，“随行”到上海的不过一百多人，但大多都是骨干。会属上海的事业、企业单位则不下六、七十个，员工散以万计。“随行人员”到达上海后，将南京工作证收回，改发上海办事处工作证。而我知吴兆洪早已取得上海市民的身份证，足可以应付户口检查。我们在上海停留直到解放，长达半年，除财务处科长余南庸赴广州帮助孙越崎发放经费，坐最后班机返沪，因没有身份证而被扣一宿；中国油轮公司副经理顾某，因油轮未遵令撤走而被扣押多日外，全部安全度过了白色恐怖，事后思量，犹有余悸。其所以幸免于难，主要是解放军及时进入市区，解救了我们。再一个原因是资源委员会内部没有出现坏人，外界难以摸清底细，敌人没有料到秀才也会造反。

但是台湾方面情形就不同了。上海解放后，资源委员会本部人员全部投向人民，事态已经明显。与我们有牵连的在台工作人员，失去了掩护，不幸牺牲了生命的有台糖公司总经理沈镇南和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珏两人。他们的死，在台湾是明正典刑的“罪犯”，没有人敢于纪念他们。可是他们的“罪行”却是间接为了解放事业。古语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就是这两位死难者的遭遇。现在就我所知，简略记叙其经过。

前面说过，台糖公司董事长吴兆洪曾电令沈镇南在计划供应大陆食糖外，每艘回航上海的轮船加运一千吨食糖，储存于上

海。直到解放，共运来食糖约一万六千吨。沈镇南主持的台湾糖业公司是台湾的经济命脉，也是台湾十大国营企业的老大哥。素来为社会瞩目。孙越崎、吴兆洪两人逗留宁、沪，台湾省长陈诚曾召见沈镇南，责问资源委员会还管不管台湾工业，不管的话，省里来管。沈镇南将情况密电孙越崎，孙南下后，本打算去台北拜见陈诚，托词搪塞，恰巧台湾来人透露陈诚到处说孙的坏话，他见势不妙，便仓促离开大陆去香港。上海解放后不久，台湾逮捕了沈镇南，香港报刊以显著版面刊出“沈镇南贪污美金一千万元，勾结大陆吴匪，枪毙于台北。”所谓“贪污美金一千万元”，大概是指运往上海的糖价；所谓“吴匪”，指的就是吴兆洪。

沈镇南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美归国后，长期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任高级职员。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接管日本三井、三菱等四个株式会社的全部工厂、农场、铁道和研究单位，组成台湾糖业公司，聘他担任总经理。任职后，以其卓越的才能，很快将被破坏的几十个糖厂修复生产。沈镇南举家在台湾，有小儿女多人，夫人当时无职业，遗族的遭遇是值得怀念的。

在沈镇南死难的相近时日，台湾电业公司总经理刘晋珏也遇害。据当时香港报纸记载，台湾查获他濒临解放时与资源委员会电业管理总处往来的密函和电报，得知刘晋珏准备运送发电机部件到上海，遂被认为是“通匪”。

刘晋珏，福建人，留学法国，是位电气工程师。抗战期间，在昆明任马街子工业基地的昆湖电厂厂长。国民党接管台湾工矿业后，我曾和他一起到台湾作过调查。台湾电力公司是以日月潭水力发电为中心的全岛唯一的电气网，曾被美国飞机炸坏，是他负责修复的。刘晋珏以多子女闻名，当时还有小儿女未成人，他们的遭遇不会比沈镇南家属好。

秘密会见王寅生和戴崇义

自汤恩伯下令清查物资疏运不力事件发生后，孙越崎觉得风险逐渐严重，要我通过季崇威，请求中共组织派正式代表和我见面，指点今后行动方针。经过几天等待，一九四九年三月间的一个下午，季崇威到“资源大楼”招呼我同坐一辆汽车，直赴虹口，在一个弄堂口停下，嘱司机将空车开到拐角处等候。我们步行约一站路，到了一所叫广肇小学的楼上，踏进一间黑暗的卧室，窗帘拉得严严的，隐约看见床边站着一个人。季崇威说：“你们谈吧。”我们互不通姓名，面对面，但容貌识别不清。我取出汤恩伯的“命令”，说明遇到的危险。他把“命令”带到窗口，挑开窗帘一角，看了一下，然后以一口无锡土音慢条斯理地答复我：

“‘命令’是严重的。汤恩伯杀人不眨眼，我们的同志给他杀得太多了。”接着又说：“共产党不作强人之难的事。汤恩伯既看重物资，那也好，能留则留，不能留就让他运走些。人是第一，物是第二。保全人是要紧的。”我又应孙越崎之托，向这位无锡人转达孙的顾虑。孙在东北时，为了俞再麟工程师毙命事，撰文骂过共产党，后来有了认识，很后悔，希望共产党谅解。这位代表说：“孙的情况我们有所了解。他靠扰人民，人民欢迎他，有什么可顾虑的。”说完，匆匆地要离开，但又用深沉而坚决的语气说：“天快亮了，注意呀！越在这个时刻，敌人越猖狂。要注意安全。以后按你们的步骤进行，和季崇威少接触些，免得有人注意。”说完，他离开这个暗室，我跟着一起向门口走去。季崇威拦住我说：“你等几分钟再走。”事后我才知道这是季崇威的家，他把妻、子都支走了。季崇威是我的堂侄，自小就分开，直到抗

战胜利才相识。以往我不知道他的家在这里，也不认得他的妻子。

孙越崎对这位共产党的代表的指点十分满意，他说：“水平高，象是一个重要负责人，我可以放心了。”

上海解放后，举行了一次“华东工业会议”，我担任这次会议的副秘书长，季崇威仍以新闻记者的身份采访新闻。我问那位无锡人的大名，他才告诉我叫王寅生，原来是位教授，现在去北京在政务院中财委任编辑室主任。一九五四年我调到北京，回忆起这段革命情谊，打算约季崇威同访王寅生，才知他已经逝世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吴兆洪另外联系了地下党线路。曾任资源委员会秘书和人事室主任，后来改就上海建业银行（领导人是龚饮冰）分行经理的黄肇兴，在他家中约吴兆洪与地下党成员戴崇义见面，但吴没有对我提过。有一次我推门进入他的办公室，见到一个陌生的客人，矮矮的身材，二十出头的年纪。客人见了我不说什么就告辞了。吴和我从童年到大学一直同学，他的交往我都相识。我问他来者是谁，他才说：“黄肇兴的朋友戴崇义，是一个共产党。”他觉得没有必要瞒着我，告诉我他是来索取上海各物资仓库的地点等资料的，并说：“我已请材料供应事务所编了一份清单给他取走。”

以后再没有见到戴崇义，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

钱昌照国外归来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吴兆洪告诉我，钱昌照（资源委员会前任委员长，一九四八年五月赴欧洲考察）秘密回来了。第二天下午，上海办事处处长夏宪讲拿了一份名单，亲自个别通知到

台糖公司小招待所开会。我应邀到林森西路（现名淮海中路西段）小招待所，见到马路两旁停满了小汽车。这地段素来冷落，忽然丛集了这么多车辆，我对夏宪讲说：“太触目了。”他中开两臂，摇摇头，表示来不及纠正了。这个招待所是只有两个卧室、一个客厅的家庭公寓，客厅面积不到三十平方米。先到的客人已济济一堂，迟到的就不得不人挤人了。清一色都是在上海各单位和会本部各部门的负责人，约四、五十人。孙越崎、吴兆洪分别致简短的欢迎辞。钱昌照即席讲话，首先概略地介绍西欧政治经济近况，接着他以充满激情的言词，赞赏和支持上下齐心一致的应变行动。他说：“上午听了越崎、兆洪两位介绍关于人、财、物的安排情况，周密而果敢，我非常高兴。你们干得比我想象的还好，你们辛苦了。……”他又引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诗句，勉励我们要坚定信心，好自为之，光明已经在望。最后他说，他来上海是秘密的，不再见客，即日仍返香港，“我们后会有期。”会见后，外面送来冷餐，各人走动着以盘叉自取，餐后互道珍重而别。翌日他悄然飞去，我们没有去机场送行。

钱昌照返港后，曾与中共夏衍、乔冠华同志等会见。事为周总理知悉，嘱香港中共组织安排尽快送他离港北上。他于五月二十一日约同资源委员会国外贸易事务所副所长周大训化名登上轮船，住在船长室内，驶抵天津，然后换车来到北平，光荣地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钱昌照别后，空着的小招待所由我家入住，与吴兆洪上下为邻，以便早晚商量工作，一直住到解放后华东工业部分配住房才离开。

吴兆洪公开南下，秘密潜返上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敌人的压力日趋增强。业务委员顾敬心从其交游中听到对资源委员会逗留上海的窃窃私议。从来和吴兆洪不相识的上海市社会局长陈保泰也带来口信：“问候吴副委员长”。我接到驻在台北办事处的参事向英华来信，反映资源委员会在台同事议论说，会本部按兵不动，是否“变成灰色了”。我们感到不仅社会上起疑，内部也可能起疑。吴兆洪特别怕CC系统陈保泰的“黄鼠狼向鸡拜年”，不安好心，约杨公兆、恽震、戴世英和我商量防范措施，决定由他公开去广州，在广州停留几天后，秘密返沪，以后不再出面，以防范外界对资源委员会的注意。在吴兆洪南下以后，其职务由我代理。我平时只和银行交往，社会上不知名，不招人注意。杨、恽两人有一定名望，而且各有自己主管的工矿企业，难以兼顾。

吴兆洪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接见了新闻记者，说明即日赴广州办公，翌日此事即见报。行前他和我约定在广州留三天就返沪，到时他给我一电：“内弟周绍达今日抵沪，恳兄一接。”接人必须有车，司机必须不认识乘客。由前任总务处长戴世英借来一辆福特旧车，司机是广州人，互相听不懂话，由我一人去龙华机场接。是日天气晴朗，吴兆洪化名周绍达，化装成病人，穿了一件风雨衣，领子翻得高高的，大口罩盖得严严的。当坐上汽车时，他说，飞机上有一位乘客招呼他，称“副委员长”。他问是哪个单位的，这人说是金属矿业管理处的。吴要我立刻稳住他，不得泄露。我送吴回到他家中后，赶往金属矿业管理处处长杨公兆家中，杨说今天确有人从广州来。他亲自去找到这位乘客，说清利

害，请他保密。夜幕降临，我陪同吴兆洪带了简单衣物从福开森路（今淮海中路西段）步行，拐了两三个弯到了友人费福焘家。他从此躲藏起来，一直到上海解放；自我“禁闭”了十几天。

需要叙述一下费福焘其人。费于抗战时任资源委员会昆明中央机器公司副总经理，抗战胜利后来到上海，任荣家申新纱厂总管理处负责人，待遇优厚，租住一个外国公寓四楼整个一层。三楼与最高层四楼之间的楼梯转了一道大弯，楼梯中段有铁栅栏门挡住，栅栏上装有电铃，大门装有窥视镜，是为防范绑票而设计的。费福焘为什么勇于招揽这个“危险分子”呢？原来他的胞弟费巩是浙江大学有名的进步教授，由于同情共产党，支持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引起舆论大哗，即为著名的“磁器口暗害事件”。费因此对国民党有深刻仇恨。我们年初移驻上海后，他曾请吴、戴和我三人在他家中便餐，我们戏言一朝有难，来此躲避，他欣然同意。费家只有夫妇两口和一个苏州保姆，十分清静。吴兆洪避来后，我、杨公兆、恽震、戴世英四人都不止一次到那里，汇报和研究工作。我们和费福焘约定，每次相见都先以电话相约，他按时在铁栅门内守望，因而不必按电铃。这座公寓，高于四邻，四楼顶上是平台，围以短墙，从上可以俯窥行人，行人仰视看不到我们。五月是温暖季节，我们每次作客，常在平台上散步。其时上海市面萧条，军警满街巡逻，红色囚车频频呼啸而过。我们觉得住在这里要比“资源大楼”保险得多。

随着解放战争的逼近，徐家汇以外的七宝镇已经解放，离我住处西二百米处的十字路口已筑起路障，架上机枪。入夜，从费家屋顶平台上极目远望，火光砲声，此起彼伏。当时我们渴望早日解放，觉得炮打得愈近愈密愈好；火烧得愈旺愈大愈好。我们凭短墙西望。“快了！”一个人信口说了一句，其余的人也不自